

師大 **台灣史學報** No. 16-17

2024年2月29日出刊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TAIWAN

**「請問濱下老師，何為『海的亞細亞』？」
座談會記錄**

「請問濱下老師，何為『海的亞細亞』？」 座談會記錄

吳密察、李侑儒、許佩賢、陳姪媛、郭婷玉、鍾淑敏、
黃紹恆、濱下武志 *

本次座談會由大家出版社主辦，2023 年 12 月 16 日於大稻埕郭怡美書店舉行，由吳密察教授擔任主持人。鍾淑敏教授及黃紹恆教授當日未克出席，但鍾教授當日提供發言稿，黃教授的文稿則為事後提供。

出版資訊：濱下武志著，吳密察主編，李侑儒等譯，《海的亞細亞：跳脫陸地中心的史學視野，海洋如何奠定亞洲的貿易、移民、世界觀和國際秩序》（新北市：大家出版社，2023 年）



圖一 座談會一景

說明：左圖許佩賢提供；右圖郭婷玉提供。

* 吳密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教授；李侑儒，國家海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許佩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陳姪媛，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郭婷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黃紹恆，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教授；濱下武志，日本東洋文庫研究部主任、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吳密察導言

首先，我先說明一下濱下老師這本論文集《海的亞細亞》是如何產生出來的。記得是我們幾個臺灣曾經在濱下老師底下讀書的學生，有人（記得好像是陳姪媛）提議在濱下老師七十七歲時齊力出版一本祝賀文集。此議一出，大家都贊成，接下來就必須要寫文章了。結果，原先大家興沖沖的，但提到要寫文章，似乎就為難了。畢竟大家都很忙，手頭上都有很多事要做，於是打了折扣，退而求其次，決定挑選一些老師的文章譯成中文集結出版，將濱下老師的學術主張、研究看法介紹到臺灣來。這樣就只要翻譯濱下老師的文章，而不必寫自己的文章，而且似乎也很有意義。但是時間畢竟很趕了，即使只是翻譯，也很難在短期內完成。當大家正在著急的時候，正好有一個事情「救」了我們（這樣說有些不道德），那就是武漢肺炎。武漢肺炎讓我們有一個拖延的藉口，沒有趕得及在濱下老師 77 歲時出版。這樣拖延下來的這本論文集出版的時候（2023 年），濱下老師已經 80 歲了！

當大家決定不寫文章，只翻譯老師的文章之後，似乎都鬆了一口氣。但是接下來卻是我的苦惱，因為大家指定我挑選出濱下老師的文章來讓大家翻譯。這真是一個高難度的工作。從數量上來說就很讓人頭痛，根據我們不精準的估計，我們老師可能十天就會有一篇文章刊載出來，而且這些文章以各種形式、各種語文被刊登在各種期刊、專刊、會議論文集或專輯裡面，可說無法掌握。那麼，老師的這些文章，要挑哪一些出來集結成一本文集呢？而且，濱下老師的研究領域，從晚清以來的金融史、海關史到華人企業史・商業史；再到東從日本，西到印度的海域史、商業史及交流史；甚至知識史（即使這樣也還是可能未完全列舉無遺）。那麼，到底要挑哪一個主題範圍的文章來集結成冊呢？這個問題確實讓我苦惱了很久。

經過一番苦惱之後，最後我想到一個好辦法（說真的，我私底下還曾經為了可以想到這個解決方案而頗得意呢！）。那就是從 90 年代（也就是我們到日本讀書的時期），濱下老師參與企劃的幾套影響深遠的歷史學叢書中找文章出來翻譯。這幾套叢書就是《從亞洲思考》（1993-1995）、《地域的世界史》（1997-2000）、《海的亞細亞》（2000-2001）。這幾套叢書都提出了新穎的視野，引領歷史研究的方向，對後來的歷史研究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將濱下老師在這三套叢書中的文章（有些

是作為主編者所寫的導論，有些是具體的主題性研究文章），挑出來翻譯集結成目前這本文集《海的亞細亞》。從這本文集，中文世界的讀者應該可以相對整體地了解濱下老師學問的面貌（但絕非全貌，因為這畢竟只是濱下老師廣闊領域的一部分，而且都是 1990 年代的文章）。

另外，我還有一件「辛苦」的工作。那就是當大家的翻譯稿交給我之後，我「盡量」地再看過一遍（所謂「盡量」，是我最後畢竟沒有百分之百完全看過）。等一下幾位翻譯者可能也都會提到，濱下老師的文章是有名的「難以讀懂」類型的文章。說真的，以前讀書的時候，雖然也讀過濱下老師不少文章，但讀不懂的時候還可以跳過去，以後再來重讀；但如今要翻譯，而且要出版，便不能不「完全克服它」。大家可能會說翻譯濱下老師的文字真的很辛苦，其實我改大家翻譯的中文稿，也很辛苦。不過，我相信這次大家一字一句「苦戰惡鬥」地看濱下老師的文章，一定有更多的收穫，得到更多的啟發。這次因為這個出版計畫，我們大家都重新再一次，而且更仔細地再讀了一次濱下老師的文章。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定對於濱下老師的學問有更深入的理解，獲得更多的啟發。

我來說明一下濱下老師文章的難讀。濱下老師的文章總是相當概念化，而且多使用長句。我們習慣的中文，長句不多（文言文更都是短句）。日文原文的長句翻譯成中文時，要不要把它打散、重組成為相對易讀的短句，一直是翻譯日文文章時困難的抉擇。日文之所以成為長句，是在該句子中存在著相互形容、限定、定義的關係，而且保留該句子的內在推理邏輯。這樣的日文句子，如何翻譯成為以短句呈現的中文，而不使原文中的邏輯、推理、定義走失了，的確是很困難的作業。另外，濱下老師的文章概念化的程度很高，含義相當濃密，經常在一個句子裡面就講了很多觀念、提示了很多問題。所以必須仔細讀、用心讀，每讀一遍也經常便會有更深入的體會，得到新的啟發。

我們這些同學都希望在這一次透過翻譯更加了解老師的文章之後，能夠有機會問問濱下老師書裡面的一些問題。所以今天才取了這一個題目：「請問濱下先生，何為『海的亞細亞』？」等一下我們就照著我們這本書文章翻譯的順序，依序請翻譯的同學發言。大家可以講對於自己翻譯文章的讀後感（也讓濱下老師瞭解我們是否真讀懂了文章？），一方面也可以實際提出問題來請問濱下老師。

李侑儒發言

濱下先生、主持人吳密察老師以及在座的各位老師、先進和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現在在國家海洋研究院服務的李侑儒，這次在論文集中負責翻譯篇幅最長的序章。之前我也曾經在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東洋史學研究室留學，相信在各位講者之中就屬我的輩份最低，因為濱下先生是我指導教授的指導教授，能有機會參加這次座談會，感到榮幸之餘，其實更多是感到惶恐。今天主辦單位交付我兩個任務，第一是回顧濱下先生的學說對我個人的研究有什麼影響，第二則是分享翻譯過程之中的感想。

濱下先生的研究博大精深，相信大家都曾多少接觸過，光是研究課題的關鍵字就可以列出十幾項。例如最有名的可能是「海關」，或是「地域史」、「海域史」，甚至是「地政論」（地緣政治論）等等，乃至這次論文集當中提及的「知域史」，也是新發展出來的重要概念。另一個大領域的關鍵字則是「網絡」（network），與此相關的研究領域像是金融、華僑，亦即資金的流動，和人的移動。此外，更有另一項著名的研究領域，即是所謂的「朝貢體系」論，對於東亞各國對外關係史的研究系譜尤其影響深遠。

概括而言，濱下先生研究的共同特色，即在於採取宏觀且遼闊的視角。以往對於日本學者著作的刻板印象，一般可能會認為他們的研究非常微觀且細膩。東京大學東洋史的傳統中，有所謂「三行主義」的說法，指的是每次二到三小時的討論課（seminar），閱讀文本的進度大概只能前進三行，師生之間非常鉅細靡遺，字斟句酌地討論文本當中蘊藏的深義。相較之下，更能對照出「濱下史學」展現出來的巨觀視野，和宏大的理論架構，也就是日文中所說的「スケールが大きい」。另一方面，濱下先生的研究雖然強調亞洲史，注重亞洲各國自身發展的主體性，但關注的課題很明顯的是全球史或世界史的格局，例如前述的「朝貢體系」論，就是近代國家概念和西方力量衝擊之前，東亞各國間自己形成的國際秩序。

濱下先生的文章可謂是「微言大義」，時常想在短短兩三句話裡傳達許多概念，以致於濃縮、結合了各種複雜的內容，讓讀者讀起來感到相當吃力。閱讀和翻譯日文時，首先必須確認文句和段落的主語（subject）。由於一句話裡往往富含多種概念，讓讀者必須反覆吟味幾次。事實上不只是臺灣人有此感受，就連日本人也一樣遇到相同的問題。但另一方面，也正因如此，造成濱下先生的文章可能讓不同的讀者發展出個人獨自的解讀，不會只有一個固定的標準答案，實際上為後進

的研究者帶來啟發，對學界整體來說則是推展了進一步的研究成果。

閱讀濱下先生的文章，若只是一次兩次迅速地讀過去，讀不懂是相當正常的事情，甚至讀到第三次時還會發現前兩次竟然都讀錯。因此，除了背景知識的查找之外，在翻譯時更需要十分謹慎，不時地回頭檢查文法與文意是否正確。順帶一提，各位讀者在閱讀中文版感到困惑時，或許會找日文版來對照，但很可能會遇到剛才提到的各種問題；此時不妨參考濱下先生的英文著作，也是另一個有效的方法。

最後我想簡單分享濱下先生的學說對我個人研究上的影響。由於我的研究領域是近世到近代的東亞海洋史，濱下先生非常強調的「地域」和「海域」概念，對我來說幫助非常顯著。濱下先生的學說尤其重視將「國家」從「地域」之中抽離出來，而國家與地域、社會之間也沒有上下之分，也就是必須將國家「相對化」、去中心化，把他視為一個在特定時空環境下獨立而客觀的存在，更透過海洋的概念，將國家與地域的邊界去除。此外，濱下先生也強調應在地域的範圍裡納入海洋的元素，從海域的歷史觀點出發，以大陸、半島和島嶼之間的海洋（sea）為中心，探討亞洲各地的發展與交流互動。這個概念尤其可以應用在臺灣史，乃至於臺灣海洋史的研究上，我們可以自行調整研究的視野和範圍，設定在臺灣周邊的海域，例如臺灣海峽、北臺灣海域（北方三島到沖繩）、東臺灣海域（宜蘭沿海到八重山群島）等等，不必受到現有知識框架的限制，促進我們進一步思考，從而在研究上激發更多的可能性。

許佩賢發言

濱下老師、吳老師，還有在場各位先進、各位朋友，大家午安，我是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的許佩賢。我是 1996 年到 98 年到東京大學留學，在濱下老師那邊學習。我要先自首，我不是濱下老師的好學生，老師的文章如果不是要我翻譯，我就沒有讀，讀了也不一定能讀懂，這一點很對不起老師。

先說一個濱下老師的小故事。我剛去留學不久，老師找我們留學生去關心一下看生活或學習有沒有什麼問題。我因為從小一直住家裡，去留學是我第一次可以享受一個人自由的生活，所以我每天非常興奮。老師問我說，來日本以後怎麼樣，我就很興奮跟他說，我覺得日本的超級市場好好玩喔。我講完之後一秒鐘，

覺得自己好像講錯話，我應該要講說，我上課怎麼樣才對啊。結果，沒想到老師也沒有覺得這個學生有點奇怪，反而開始跟我分享，他以前去超級市場買菜的事情。他跟我說去超級市場一定要買豆芽菜，又便宜又好吃。濱下老師的學問當然十分令人尊敬，但對我來說，那個跟我分享豆芽菜、作為普通人的濱下老師，也讓我很感動。圈圈（海域圈）加上豆芽菜，加起來就是我腦海中老師的圖像。

回來講這本書，我這次負責的主要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 90 年代初期那幾個系列套書的導讀、幾篇比較短的文章；第二個部分是終章關於陳荊和的文章。我這幾天重新再讀一次這些部分，當然還是很多讀不懂，但我想到了兩個閱讀濱下老師的方法，第一個是「代換」；第二個是「解壓縮」。

先講「代換」。老師思考的規模很大，例如「海的亞細亞」，應該是相對於傳統只從陸地來看亞洲的觀點，而提出從海洋來看亞洲。我試著把老師的「亞細亞」，代換成我們比較熟悉的「臺灣」，我覺得全部都可以通耶。「海的亞細亞」變成「海的臺灣」，不要從陸地來看臺灣，而是從海洋來看臺灣，不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臺灣史圖像嗎？「從亞洲來思考」，代換成「從臺灣來思考」，也很可以看到不同的歷史圖像吧。不是從清帝國時期的北京、不是從日本帝國統治時期的東京來思考臺灣，而是從臺灣來思考臺灣，甚至從臺灣來思考帝國。

《從亞洲來思考》的第一卷主題是「交錯的亞洲」，意思應該是有很多不同的歷史動力交錯在亞洲這個空間。那麼，我們也可以想想看，各種歷史動力交錯在臺灣的樣貌，考察「交錯的臺灣」也是臺灣史研究很重要的課題吧。

這一卷的導讀，也有收在本書中，老師在文章開頭是這麼說的：

從亞洲整體來理解亞洲歷史，近年越發增加其重要性與急迫性。理由是亞洲本身也在變化，為了看清其現在與未來，也有必要從亞洲內在的歷史脈絡來加以理解。同時，從「現代」這個時代之自我認識的變化，也可以導引出瞭解亞洲歷史的現在意義。

如果把這些「亞洲」代換成「臺灣」，我們再讀一次。

從臺灣整體來理解臺灣歷史，近年越發增加其重要性與急迫性。理由是臺灣本身也在變化，為了看清其現在與未來，也有必要從臺灣內在的歷史脈絡來加以理解。同時，從「現代」這個時代之自我認識的變化，也可以導引出瞭解臺灣歷史的現在意義。

這樣代換過來，是不是完全沒有「違和感」呢？我自己覺得，90年代初期，老師在做這些研究的時候，不一定直接關注到臺灣，但從90年代臺灣史開始發展，到現在經過了30多年，我們現在也開始需要重新思考臺灣。老師當年重新思考亞洲史的這些方法、觀點，可以提供臺灣史研究很好的一個參照。這是我想到的第一個解讀濱下老師的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解壓縮」。老師的文章是壓縮了好多概念寫成的。為什麼李侑儒老師說，讀三次會讀出不同的意思，或是三個人有三種解讀法，這是因為老師的文章壓縮了太多的訊息，每個人解壓縮的程式不一樣，所以解開來就不一樣。

那麼，我試著用自己的解壓縮程式來閱讀〈從臺灣來思考東亞史〉這一章。在這一章中，濱下老師也有提到我們都很熟悉的曹永和老師（1920-2014），但主要其實是在講跟曹老師年代差不多的陳荊和先生（1917-1995）。兩位都是臺灣出身、為戰後第一代從事亞洲研究的知識分子。老師怎麼說研究陳荊和的意義呢？老師說，找出陳荊和這樣的一個人物，是要「思考他們作為臺灣知識分子的時代觀，以及在這種時代觀下所展開的研究軌跡」。

從這裡我就想到，不同世代的「臺灣知識分子」會呈現什麼不同的時代觀和研究軌跡呢？比方說林茂生（1887-1947），他大概比陳荊和早一個世代，在日本時代受教育，也在日本時代開始做研究，很可惜他沒有辦法在戰後繼續做研究，就死於二二八事件。雖然，關於林茂生，已經有駒込武老師很好的研究（駒込武著，蘇碩斌、許佩賢、林詩庭譯，《「臺灣人的學校」之夢：從世界史的視角看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臺大出版中心，2019），可是如果我們從「臺灣知識分子的時代觀，以及在這種時代觀下所展現出來的研究軌跡」來思考，是不是有可能可以看到不同的林茂生呢？

又如謝仕淵老師最近寫了關於臺南研究者石暘睢（1898-1964）的專書（謝仕淵，《成為臺南：府城文史活字典石暘睢》，蔚藍文化，2023）。石暘睢的年代大概介於林茂生與陳荊和中間，一輩子幾乎只做臺南的研究。這樣的一個研究者，怎麼樣去看他作為一個臺灣知識分子的時代觀，以及在其時代觀下所展現出來的研究軌跡呢。這是我覺得接下來我們要從濱下老師的提示中，進一步去思考的問題。

其次，從陳荊和這篇文章我也開始想，到底陳荊和這樣的亞洲研究者是怎麼培養出來的。他是臺中出生，小時候就在日本受教育，後來念了慶應大學史學科。我好奇查了一下陳荊和的家庭，結果發現原來他的父親陳茂堤（1893-1977）是日

本統治前期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回到家鄉開業，後來又到日本留學，在慶應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其實，臺灣第一代知識分子，要講他們思想研究或歷史研究的軌跡很不容易。因為當時臺灣知識分子，幾乎都是做醫學研究，而不是人文研究。但如果我們實際去看他們的生命軌跡，也許也可以從他們的實際行動、選擇，來看他們的時代觀。

第三，就是剛才其實李老師也有提到，星期四在師大跟周樑楷老師的座談也有提到「知域」的概念，這應該是「地域性的知識」這樣的概念或想法。這裡有一段話，我也想跟大家一起讀一下。老師說，「在全球化這種新的研究條件中，如何把歷史研究與思想研究的關係，嵌進臺灣的歷史時間，以此來理解活在亞洲這個『知域空間』的臺灣知識分子之樣貌，同時也將其召喚至現代。」老師在書中也提到有「南洋知」、「東亞知」、「西洋知」等「地域性的知識」，那麼在臺灣也一樣，比方說在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可能也有「帝國知」，也有「臺灣知」，甚至也有「臺南知」，我們如何從這種重層的「知域」來思考臺灣知識分子的思想與行動呢？其實我沒有答案，我的解壓縮工具解不開這個檔案，如果可以的話，想請老師再多談一下，怎樣從「知域」去思考臺灣知識分子的樣貌；除了陳荻和這樣的人物之外，我們可以怎麼從「知域」的視角去思考臺灣知識分子的樣貌，然後怎樣將其召喚到現代。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大家。

陳姪媛發言

大家好，我是負責第三章及第四章翻譯的陳姪媛。雖然我以翻譯者的名義出席今天這個寶貴場合，但我並沒有打算直接聊到我擔任翻譯的章節有何內容，甚至也沒打算講到濱下老師有何具體的研究貢獻。相反地，我想透過我自己在濱下老師的引導與鼓勵下，從一個對臺灣什麼都陌生的外國人，如何搖身一變，加入臺灣史研究的行列，並立志研究臺灣史，藉此提供一個實際案例，希望大家可以從我的學思歷程，發現老師的亞洲研究，如何有形無形地啟發個別研究者關心臺灣，並且未來也直接、間接持續發揮影響力。

我算是老師在東大的關門弟子。1996 年我大學畢業後就立即留學日本，進入東大東洋史研究室，並請老師當指導老師。現在我都還清楚記得，我到東洋文化研究所第一次找老師，爬樓梯到四樓，打開灰藍色小門後看到的模樣。老師當時

已是馳名國際學界的大師，研究室卻僻陋狹小，盈箱溢篋，甚至地上到處都是用書堆起來的好多座書山。而且看似隨手放置的書，其實哪些書埋在哪座書山裡，老師都一清二楚。對此，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相較之下，當時我跟老師究竟交談了什麼事，我卻什麼都不記得了。果然，不久後我就從學校失蹤了。雖然保留著學籍，但心中很清楚自己沒能完成學業，只是煩惱著該如何向老師報告自己最終只能決定放棄學業，並向老師道歉。

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找老師，是離碩士論文交稿期限還不到幾個月的冬天。我原本只打算好好跟老師道歉並道別，沒想到老師還鼓勵我立即開始論文，說現在可不是該放棄的時機。真正離譜的是，當時我連題目也都沒有決定，卻敢冒這個險。截止日期迫在眉睫，題目跟資料都請老師代為決定——就是中國經濟思想家鄭觀應的婦女觀。就這樣，我在中國經濟史泰斗的指導下，莫名其妙地就踏出婦女史研究的第一步。

後來我也問過老師，為什麼是婦女史。老師說，他常常在資料中遇到婦女相關論述，一直感到好奇，幸好最後一位學生找不到研究題目，當然要試試看這個主題。還好我來得及寫完碩士論文，還進一步升上博士班，持續挖掘女性有關的問題。後來我也有機會認識不少婦女史專家，經常被問到為什麼特別請濱下老師當指導老師，卻沒有人問過我，濱下老師如何引導我做婦女史。

不過，我的迷惘與徬徨還沒結束。進入博士班不到一年，我再次陷入另一個人生低谷，苦悶到經常回頭問自己，寫碩士論文當時究竟怎麼突破困境。這個思考邏輯讓我很想念一位當時已經離開東京的朋友——就是在座的許佩賢老師。佩賢在我碩士班時來東大留學兩年，最後幾個月她也願意當我朋友，鼓勵我完成論文，但那一年春天我上博士班，她只留下她的腳踏車，就返回臺灣了。東大的東洋史課程讓博士班學生跟碩士班一起上課，對我而言，兩者其實沒什麼不同，只是少了這位朋友而已。有一天我找濱下老師透露自己內心的想法，濱下老師就說：這還需要煩惱嗎？打電話訂機票，到機場坐飛機，然後找她就好，不是嗎？果然是有「機場教授」之稱的老師，但我就這樣來了臺灣。很幸運地，因為老師當年剛好在政治大學任講座教授，我在臺灣，透過佩賢跟濱下老師的人脈，自然就認識了很多學者們，其中包括我過去並不熟悉的臺灣史專家們。對他們而言，我不是不及格的不良學生，而是濱下老師跟佩賢引介的有前途之年輕學者。如此一來，對我而言臺灣不只是一片新天地，更成為我試著重生的諾亞方舟。我就這樣培養

出對此塊土地及臺灣史的某種感情與使命感。不過，我自己完全轉換跑道成為臺灣史學者，還需要一段時間。

在那之前，我先在 2003 年完成了博士論文，當時人也是在臺灣。那一年濱下老師快要從東大退休，迫使我間不容息地趕出論文，並成為他在東大的關門弟子。完成博士論文沒有多久的 3 月，我也前往東京參加老師在東大的告別演講。從亞洲各地匯集來的學生裡，有許多臺灣史專家，包括在座的吳密察老師及鍾淑敏老師。事後來看，當時演講內容引發大家最多討論的一個謎題——即「第二人稱的歷史」，¹ 正說明我個人最後不能不加入臺灣史行列的背後脈絡。



圖二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時期的濱下老師

說明：2005 年 10 月 11 日搬遷研究室到京都大學前，拍攝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4 樓濱下老師研究室。陳姪媛拍攝提供。

¹ 濱下武志，箱田惠子、劉素芬譯，〈歷史的觀點與現代——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5（2003 年 3 月），頁 67。

第一人稱的歷史與第三人稱的歷史，每個人都多多少少能推測其涵義。如果前者指的是單純順著學者自己的看法寫下的歷史，後者則是，我們先擱置個人主觀的看法，更著重資料的客觀性，以進行研究，以利保持跟書寫對象之間的距離。那麼，究竟什麼是濱下老師最後提醒學生們的第二人稱之歷史呢？根據當時老師的解釋，第二人稱的歷史是以「關係」為前提的歷史研究。我當然未能一時就聽懂。為了了解這個不可思議的說詞究竟有何深奧的道理，我也不時找找看其他學者們的討論，看看是否有類似的說法，不過總是徒勞。² 時間再過差不多 20 餘年，現在我反而從我自己接下來的個人經驗——尤其我自己如何慢慢成為臺灣史學徒之此一心路歷程，彷彿很模糊地體會到老師所提倡的第二人稱的歷史是什麼。

我在這篇短文中，都還沒講到自己出身韓國。這並不是故意的。不只是出身地，我很不習慣透露自己的各種身份，藉此儘可能迴避面對屬於自己的各種社會標籤，以致寧可決定寫作中不使用第一人稱。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篇應是我第一次用第一人稱公開出版的文章。這種人格特質自然也影響我對於歷史學門的選擇。雖然在濱下老師的引導下，我曾踏入過女性史這一塊，但當初也想過我寧可做男性史。實際上，我曾投履歷，都在學術專長填寫為媒體史或知識史，藉此儘可能迴避認同自己是婦女史學者。或許也因為如此，接下來我投入的，不是讓我在治學過程中自然成為第一人稱的朝鮮史研究，而是臺灣這塊寶島的歷史。就算一樣是外國人的臺灣研究，因為我就直接在臺灣面對臺灣人從事臺灣史研究，對我而言這與其說是「他的歷史」，更接近於「你的歷史」。換句話說，雖然臺灣史讓我永遠只能佇立在第二人稱，但同時我也彷彿藉此一時舒緩自己前階段的心理壓力。

最近，我也進一步開始學臺語，才恍然大悟成為臺灣史學徒，或許是唯一我能夠一點點面對自己的管道。就像濱下老師 20 年前的提倡，我們現在需要新的歷史研究觀點——即第二人稱的歷史書寫。不像第一人稱的歷史研究單純關注自

² 例如，生死學家 Kübler-Ross 曾討論過，人們如何經過第三人稱及第二人稱的死亡經驗，最終體會或接受第一人稱的死亡。Elisabeth Kübler-Ross ed., *Death: the Final Stage of Growth*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5), p.25. 另外，人類學家陳文德基於其在卑南族的田野經驗，嘗試解釋卑南族在異族接觸的歷史過程中，產生何種人群分類及社會關係的概念。陳文德，〈我們、你們、他們？當代台灣人群分類現象的省思〉，收於余舜德、張珣、劉斐玫編，《人類學家的我們、你們、他們》（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8 年），頁 223-249。又，日籍法文學者森有正也透過日文與法文之間的比較，指出日語具有以第二人稱為中心的語言結構，並且深入影響日本獨特的社會關係。水林章，《日本語に生まれること、フランス語を生きること 来たるべき市民の社会とその言語をめぐる》（東京：春秋社，2023 年），頁 171-187。

身，也不像第三人稱的歷史研究，以客觀化的名義消除歷史書寫的主體；第二人稱的歷史書寫，雖然需要先體會並咀嚼「他者」的立場與看法，但最後期待透過「關係」將「他者」連接到「我們」跟「我」的歷史。然而，假如願意接納第二人稱的歷史研究的學者，從來沒有正面正視過「我」或「我們」——也就是說，就像我一樣，一直迴避面對第一人稱的世界的學者——那麼，第二人稱的歷史研究尚有可能嗎？

我的臺語教科書提醒我，臺語中第一人稱的複數代詞，不只有「阮」，還有包含第二人稱在內的「咱」。³ 我不清楚是否在其他語言裡也有這種第二人稱代詞，但至少可以說，臺語所象徵的臺灣社會裡，第二人稱的「你們」並不注定只扮演別於「我們」的他者；相反地，臺灣這塊寶島仍為「第二人稱者」保持著與「阮」一起成為「咱」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因為臺灣仍留著讓「第二人稱」者融入到「第一人稱」的「我們」之可能性——即濱下老師所說的「關係」，就算我在臺灣史領域中終究不能擺脫或「第二人稱」的立場，但仍可透過我的「第二人稱」之臺灣史研究，期待從中找回自己的「第一人稱」的歷史書寫。

最後讓我回到一開始提的問題——即濱下老師的亞洲研究，對臺灣史研究究竟留下何種影響。濱下老師實際上沒有真正投入過臺灣史研究，但他不僅培養出正在率領臺灣史學界的許多傑出學者，包括吳密察老師、鍾淑敏教授，還有我的好友佩賢，他推動出來的史學方法，實則進一步展望臺灣史這個新穎學科的未來治學策略。正如曹永和老師的「臺灣島史觀」提醒我們，因為這塊寶島匯集並交叉了許多不同族群與文化，導致我們今日不易僅依據「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來編織臺灣史。如此一來，跳脫以往的歷史書寫方式，改以多數族群之間的「關係」為新的核心策略，不僅使得臺灣史找到貫穿其 400 年的一貫脈絡，在此，濱下老師心目中的第二人稱的治學理想也終於找到落實的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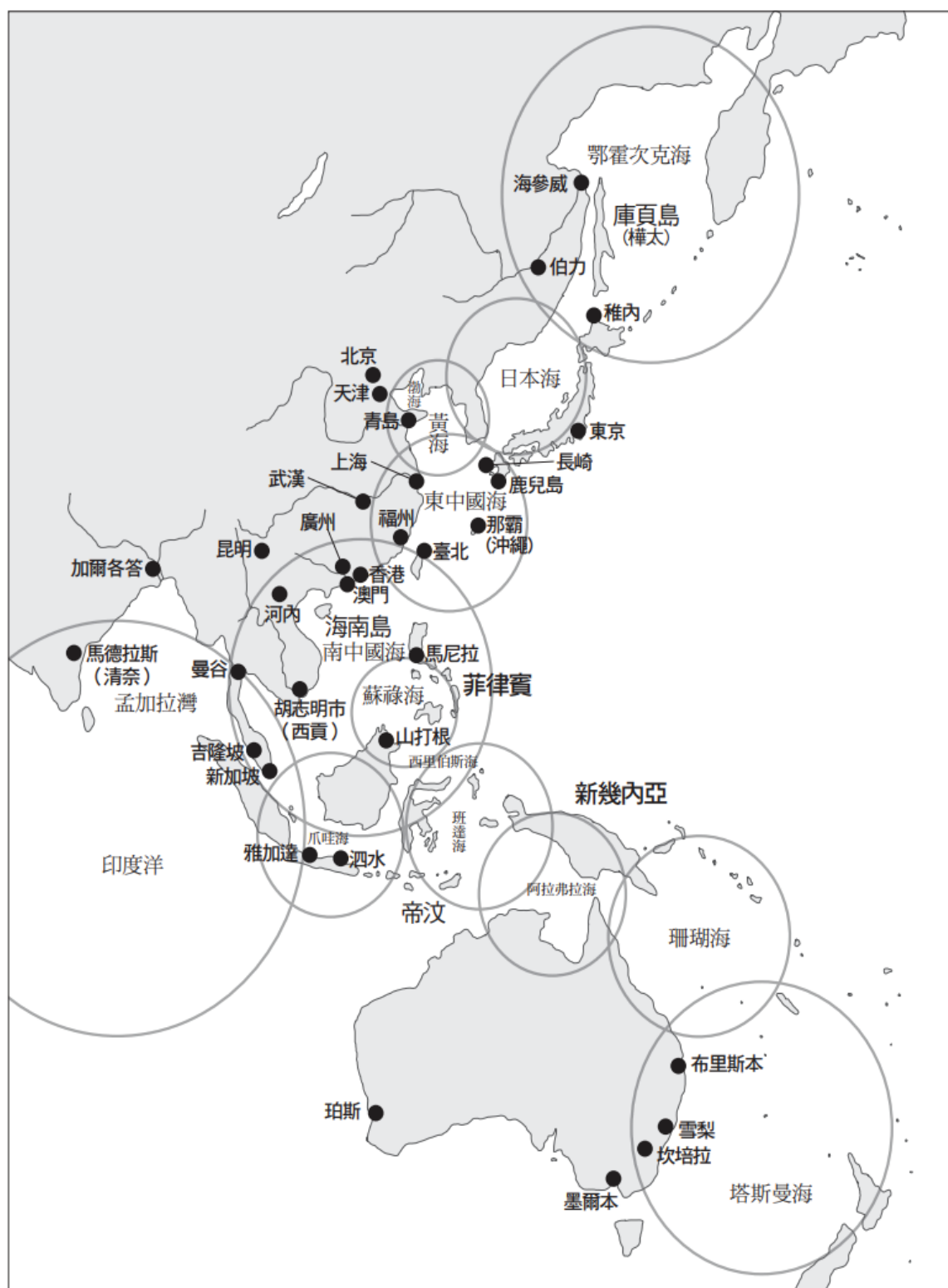
郭婷玉發言

大家好，我是翻譯第五章的郭婷玉。首先，像剛才吳密察老師介紹的，其實三年多前就開始這一項計劃，當時是陳姪媛老師跟許佩賢老師邀請我加入翻譯。三年多前翻譯完以後，到了最近，出版社聯絡我們要再重新推進出版這件事，請

³ Lau, Seng-hian, *Superb Taiwanese Primer*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23), pp.58-59.

我們看一下自己負責的文章，我才發現三年前我不知道翻譯了什麼，所以又重新修正了一次。但是，裡面應該還是有很多大家看不懂的地方，所以先跟大家抱歉。

今天我跟濱下老師是初次見面，沒有什麼小故事可以講。不過，我覺得自己翻譯這篇〈從東方探究的海洋亞洲史——朝貢與倭寇〉滿有意思的，可以稍微談一下這些部分。這本書一開始有一句話很重要，濱下老師告訴我們，「海洋這樣的場域，沒有歸屬、全然相連。任何人都能利用海洋來共享人、物、錢、訊息，從而四處活動。探究亞洲的海洋，同時也能重新審視世界。」濱下老師的研究通常都是講一個很廣的概念，打破我們過去對國別史的想像、地域史的想像。例如剛才老師們提到濱下老師談「知域」，就是一個共享知識的空間。



圖三 17 至 19 世紀亞洲海域的交錯

出處：濱下武志著，吳密察主編，《海的亞細亞：跳脫陸地中心的史學視野，海洋如何奠定亞洲的貿易、移民、世界觀和國際秩序》，頁 140。

在我翻譯的這章，濱下老師談到海域的世界（圖三）。例如沖繩透過附近的海域跟鄰近東亞各國產生連結關係。通常我們講東亞，可能只注意東北亞，不過濱下老師的研究就是包含從北到南的整個東亞地區，包括南洋的部分，像是菲律賓、南亞。所謂的「海域世界」，第一個是沿海海域，就是陸海交界的地方。第二個是環海海域世界，也就是交易港口跟都市之間的連結，例如臺灣過去透過臺南跟廈門對渡。第三個港灣都市連接不同的海域，像過去十三、十四世紀琉球王國連接明帝國的貢品與朝鮮、日本等地，或是過去香港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金融，以及新加坡是南洋產品、香料的樞紐等等。

那這個海域之間的交流呢？我覺得老師在這一章裡面也給了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談政權怎麼樣和沿海居民之間產生關係。其中一個方式是透過神。我們臺灣人很習慣媽祖，現在有些人會叫她天后。不過，其實她的封號是從天妃、天后這樣一路升官。原來最早媽祖這個海神的出現，是沿海居民、漁民要出海的時候，一個安定人心的心靈寄託。各地陸地政權，比如說明清帝國，想要控制到沿海地區的時候，就會選擇說我（國家）把你們的神明也納入國家祭祀的正式神明。透過把神明正式化的行為，國家也可以管控到人民的祭祀活動，也就是讓地方信仰變成一個正統的國家神明。

再回到剛才一開始談到的朝貢制度。現在有很多新的研究，特別是濱下老師的研究提到，朝貢制度不只是一個控制體系，也是一個國際關係、或是貿易關係。朝貢體系像一個同心圓（參照本書頁 35 圖 1「華夷秩序下的區域關係—以清代為中心」），最裡面的中心是中央、第二圈是地方，再外面一點是藩屬，最外面才是朝貢。朝貢之外還有互市。在我翻譯的第 5 章裡面，濱下老師提到，明帝國的朝貢貿易是以明帝國為中心，和海外各國形成一個親疏關係。所謂的親疏關係，是明帝國跟各國有關係的遠近，不是和每一個國家的關係都一樣。也就是像同心圓由內往外一般，有親近、疏遠的關係變化。



圖四 洪武初年朝貢網絡

出處：壇上寬著，郭婷玉譯，《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 4：陸海的交會》（臺北：聯經出版社，2021），頁 75。

朝貢制度也有政策的變化。在這裡，借用一張我翻譯另一本書的圖（圖四）。一開始的朝貢制度，是海禁加上貢舶貿易（「貢市合一」），就是允許外國的朝貢船來明帝國貿易。到了隆慶元年（1567 年）緩解海禁以後，就變成貢舶免稅貿易、課稅貿易都可以進行。這裡借用的這張圖是洪武初年的朝貢貿易網絡，可以看到，洪武初年定都在南京，由明帝國首都南京連接到爪哇、占城、暹羅、安南，另外還有琉球、高麗、日本等地。明帝國是這樣定義國際關係的，也就是貿易關係和政治演進綁在一起。

剛才說到親疏關係很重要，是因為親疏關係影響到進貢週期。進貢週期也會依明帝國的財力有一些變化，比如說琉球是一年一貢，朝鮮是一年一到三貢不一定，越南則是三年一貢。朝貢週期和明帝國財力的關係，是因為每一次朝貢貿易，各國使節帶東西來明帝國朝貢，明帝國要回禮，回禮一定要比使節帶來的貢品多。所以，各國若是太常來朝貢，明帝國會受不了。每次來朝貢的時候，對朝貢國最重要的，除了使節團帶貢品來以外，還有濱下老師在文章裡面也提到，特許商人的會館貿易相當重要。他們可以帶回明帝國生產的絲綢、瓷器，再轉賣到其他國家。明帝國大致上是用這個方式進行對外貿易，如果你不是這些可以朝貢的國家，就必須跟朝貢國買這些東西，所以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流通制度。



圖五 琉球萬國津梁之鐘

出處：郭婷玉拍攝（2019年7月18日）

朝貢國裡面最重要的，就是濱下老師用來當做例子的十三、十四世紀琉球王國東亞海上貿易網。我們知道，琉球王國是在臺灣之前的東亞貿易樞紐。這是因為，琉球和明帝國的關係非常好，常常去朝貢。由於明帝國東南沿海有倭寇的問題，他們不跟日本做貿易。所以，日本必須透過琉球去取得明帝國的絲綢、瓷器。還有朝鮮，也會購買琉球從南洋貿易拿到的胡椒、蘇木，再拿去明帝國進貢。

到十五世紀的時候，琉球王國有一個萬國津梁之鐘（圖 5）。萬國津梁是各國橋樑的意思，它的複製品現在應該還在首里城前面。萬國津梁之鐘上面的銘文寫到，「琉球國者，南海勝地。而鐘三韓之秀，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在此二中間湧出之蓬萊島也。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異產至寶充滿十方剎……。」從琉球王國的貿易網絡也可以看到，它連結了從北京到日本博多、再到南洋爪哇，是一個非常大的貿易網。

我看到這裡的時候，因為我自己對琉球很有興趣，就想請問濱下老師一個問題。老師的研究寫到琉球比較早的歷史，後來十七世紀東亞貿易樞紐從琉球變成臺灣以後，這對琉球王國的發展、琉球跟日本的關係，或者是琉球跟臺灣的關係有沒有什麼影響呢？

我的報告到這裡結束，謝謝大家。

鍾淑敏發言

我是鍾淑敏，正在新加坡做短期訪問研究。本來預定用連線方式參與本次活動，但是不管用哪種形式預先錄影做報告，對我都太困難，因此只好請許佩賢教授代為宣讀，敬請濱下老師與現場的朋友們見諒。

我負責的部分是談地域空間的問題，在這裡要介紹〈歷史研究與地域研究——歷史展現的地域空間〉與〈地政論——統治史中的地域與海域〉這兩篇，這是我家兩個人（編按：鍾淑敏及陳進盛）翻譯的章節，因為內容有許多比較偏向方法論的抽象概念，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必須相互討論以避免理解錯誤，所以也在這裡一起做報告。底下是兩篇論文的章節，我想光是將章節名稱唸出來，從所觸及議題之廣泛，讀者大概就可以想像濱下老師怎麼去思考相關問題，怎麼將看似不相關的議題藉著海、海與海的連結等關鍵用語加以聯繫。

〈歷史研究與地域研究〉的章節包括：（一）為何研究地域；地域概念的外延與內包。（二）地域研究的動機與契機：歷史中的地域；學科領域（Discipline）的變化；認同（Identity）與歷史認識——從「事實」認識到相互認識；價值評價的變化。（三）地域與海域：海域的連鎖；海域的延展。（四）地域的開展：境界劃定與世界認識；歐洲的地域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網絡——從離散到地域統合。（五）地域的描述方法：從時間軸走向空間軸——中國史所見的「方志學」；方志學與地政

論；地域研究的方法—學科領域、史料與田野調查；以主題所描繪的地域研究；開放的地域研究之可能性。〈地政論——統治史中的地域與海域〉的章節則包括：

（一）現代世界的地政開展。（二）地政研究的課題與方法：地政的概念；地政研究的歷史與方法；核心—邊陲論、體系論及地政文化論。（三）地政論的現代課題。

（四）中國的地政與地政論：地緣政治—地政觀點中的中國世界；地政學在歷史研究的應用（倭寇研究、中央與地方關係、地域間的位階）；都市、農村及村落社會的調查研究（都市—農村關係、村落的再建設、家政、社會單位與國家）；地政論的記述方法。（五）環繞琉球／沖繩的亞洲海域：亞洲的海；朝貢與貿易網絡。

（六）亞洲的海洋霸權：沖繩與亞洲的地域間關係（琉球／沖繩的地政位置、琉球與海的自我認同；地政論的可能性。從上述的章節中，大家或許可以感受到濱下老師思考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在翻譯過程中，常覺得好不容易抓到一點頭緒了，卻又在下一段落中失去了方向。

雖然濱下老師的抽象思考非常複雜，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我們在翻譯過程中常常陷入文字迷霧中。幸好濱下老師善於製作圖表，豐富的圖表可以幫助讀者理解內文所述，也給人更多馳騁想像的空間。我甚至建議讀者們，可以先閱讀圖表，至少對圖表要看得更仔細，因為這不但畫龍點睛，而且可以幫助我們進入「濱下世界」。例如第 243 頁的「亞洲的交錯海域」，讀者很容易掌握由沿海、環海及連海的組合所形成的海域固有的交易圈與移民圈。

在這兩章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 245 頁的「琉球/沖繩歷史上的腹地模式」，這張圖以琉球為中心，很生動的畫出琉球與日本、朝鮮半島、中國、臺灣、東南亞、菲律賓、太平洋各地各自不同的關係，如果再加上第 250 頁的「南西諸島的立體構造」表，琉球各島之間的階層性更添加了琉球群島的複雜性。我也試著思考，如果以臺灣為中心，縱向的與橫向的臺灣，又可以畫出什麼樣的臺灣關係圖呢？不知道老師怎麼看呢？

另外一張我覺得很有趣的圖是第 177 頁的「中國人與印度人的移民網絡」，老師在這裡要強調的是「移民、匯款、交易等所建立起來的流通、移動網絡，向來被視為是離散，即被當作喪失原本地域認同的過程。」但是當「移動、流動的側面被組織成網絡，重新被編組成長距離的連結」時，「向來的民族流散，如今卻開始展現為長距離的地域間連結。」這裡以中國與印度為例，將離散視為網絡的擴散，我覺得很有啟發，但是也不禁想問濱下老師，這張圖以中國和印度為中心，

空間的位置與平常我們所熟知的地圖不同。這個看起來似乎扭曲變形的世界地圖，是否有特別意涵？

最後，我認為濱下老師的地域研究對臺灣史的研究方向具有提示性。老師指出地域研究的特徵是探討開放性、分散性或是向外開展的外向性，並且強調彼此間相互影響的多角化關係。另外，地域研究的研究主題，並不在於分析上下關係，而是分析研究橫向展開的關係，因此，地域研究與其說是重視時間軸的地域變化，毋寧說重視地域的固有性，來思考地域所具有的歷史連續性、傳統性側面。我想請問老師的是，如果以此來理解「臺灣島史」，不知道是否正確的掌握了濱下老師的意思？

黃紹恆發言

很榮幸能參與濱下老師論文集的翻譯計畫。

我從 1988 年開始參加濱下老師的課程，一直到 1994 年離開日本為止。在這段期間，我遇到了吳密察、飯島涉學長（容許我這樣稱呼），以及稍後加入的吉澤誠一郎、川島真、廖赤陽等學弟（同前）。濱下老師的學生人材輩出，有許多在今日已經是臺灣及日本學術界的代表人物。而當時的東大有很多學問淵博且具個人魅力的教授，濱下老師就是其中一位。

我最初抱著臺灣黨國教育下所學得近代中國史的認知，以經濟學研究所學生的身份，跨系去修濱下老師的課。當時還是濱下老師指導學生的吳密察教授以甲午戰後初期臺灣貨幣問題所做的報告，至今還留下些印象。爾後隨著研究所學習時間的增加，逐漸確定自己學位論文寫作方向的同時，濱下老師的課對我而言，從最初多少帶點「獵奇」的意味，轉向開拓視野的重要性。

東大大學院經濟學研究科的日本經濟史研究，由於國內的公私史料豐富，因此相當集中在日本本土經濟課題的深入研究，戰前臺灣的經濟雖然概念上屬於日本資本主義的一環，但是由於臺灣經濟屬於海洋國家開放型的體質，因此需要的預備知識與史、資料，以及處理的研究課題，多半必須涵蓋東北亞到東南亞，即整個環中國的海域。對我而言，濱下老師的課，重要的不是告知臺灣在這個海域發生了那些故事，而是提示如何跨區廣域思維自己的研究課題。我在研究所學生期間主要的研究課題是幕末到明治期為止的日本糖業問題，濱下老師在這方面給

予了許多相當重要的啟發，我因此注意到爪哇糖與臺灣糖在日本國內市場的競合關係，也察覺到像陳中和這樣的大糖商利用金銀對價的變動，賺取額外的匯差，增加其砂糖販售利益之情形。但是也嗅到這個金銀價格問題是個複雜難懂的問題，因此當時有意識地趨避不談。

日治初期臺灣以銀為基礎的秤量貨幣，從臺北帝大教授北山富久二郎的研究起，始終予人前近代落後的商業慣習印象，然而在 19 世紀後半起，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紛紛改採金本位制的當下，環中國海域各地區間依舊相當程度維持以銀為基礎的交易。我負責翻譯的這篇文章（雖然原文真的有點艱澀難懂），則以概念上的「朝貢貿易圈」範疇為基底，論述中國與環中國海域、華僑華人的金流及物流，在以金本位制為基礎的 20 世紀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歷史條件下，其實際運作狀況與所具歷史意義。從濱下老師的論述可清楚看到歐美資本主義列強進入這個海域之前，此區域已然運行著具能動性的（華）人與物的網絡，以銀為基礎，貨幣本身價值等同購買能力的秤量貨幣，則撐起來此區域金融面的多重性。

換言之，儘管環中國海域的許多國家或地區淪為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附庸國或殖民地，在金本位成為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主要的政經框架下，以銀為基礎的交易應可理解為歐美資本主義列強殖民統治的政經局限，以及前殖民地階段此區域經濟的自律性依舊健在。濱下老師強調這種構造有相當程度延續至今，成為理解今日環中國海域政經關係的重點。因此也可說傳統西力東漸及亞洲國家無力抵抗的殖民地化認知，只是過於簡化的片面管見。

面對 19 世紀後半開始的這種全球政治經濟變革，濱下老師這篇文章所描繪出以傳統中國為中心來看的歷史圖像，與日本經濟史學家石井寬治老師站在 19 世紀中葉新興工業國日本的視角，所論述的歷史圖像不太一樣。

日本於甲午戰後以得自中國的賠款，「毅然」地施行金本位制。為何用「毅然」的語彙來形容這種貨幣政策的變革？其理由在於以當時日本工業化程度及所能出口的商品，銀本位的中國市場對日本而言，有著事關明治維新成敗的重要性。甲午戰爭的爆發，朝鮮東學黨農民抗爭雖然是直接的導火線，但是其背後存在著明治日本對中國市場的殷切期待。面對國際銀價下跌的趨勢，幣制改革以黃金計價的日圓及以此日圓決定的商品價格，對日貨的中國輸出造成明顯的不利影響，然而日本還是施行了金本位制。

對此，石井老師認為日本政府當時的想法在於為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施行金本位制，以黃金計價的日圓有助於從歐美資本主義列強進口工業製品與設備、技術。不過，實際上，對歐美資本主義列強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視與學習，冠上「文明開化」的宣示，卻無法改變明治期日本與歐美資本主義列強的貿易，仍為農業國與工業國交易的本質，並不因為金本位制的幣制改革，消弭不斷積累的對外貿易赤字。只是甲午戰後大約每隔 10 年一次的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日本的國際政經地位持續上升，尤其歐美資本主義列強在一戰期間的撤退，除了一掃日本的鉅額的貿易赤字，更因此搭上帝國主義列強的最後班車。日本於甲午戰後揚棄銀本位制，以及多少帶有冒險意味的「毅然」施行金本位制度，結果因此成為正確的歷史性選擇。

日治時期臺灣的幣制，昔年念研究所的時候，只知道當時各種公文書與出版物都說係日本政府當局鑑於短期間內無法改變臺灣既有慣行，因此臺灣銀行發行的臺灣銀行兌換券仍以銀為基礎，其發行準備有相當部分還是日本施行金本位制後，失去發行準備功能的銀塊。當時銀行發行的紙鈔之所以稱為「兌換券」，說明由實體貨幣變遷到信用貨幣的過程，可隨時兌換回本位貨幣（金銀之類的實體貨幣）的紙鈔，才為社會大眾所接受，日治初期的臺灣銀行紙鈔正扮演著這種角色。但是另一方面，由於金本位國家拋售白銀致使國際銀價下跌，相對黃金廉價的白銀從海外流入臺灣換成臺灣銀行兌換券，這些紙鈔再兌換成金本位制的日本銀行券，再依法由紙鈔換成黃金，亦即這股「熱錢」以臺灣銀行券為破口，最終動搖到日本金本位制的穩定。因此臺灣銀行券由銀本位制變更為金本位制，未必全然出於臺灣本身經濟發展的需求。

變成以金作基礎的臺灣銀行券對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是個重要且困難的研究課題，我個人迄今也不甚了解。從《臺灣日日新報》的新聞報導，大致可感覺到物價、工資水準的上漲，可能是關連的現象。然而其更直接原因應該在於日本政府所謂「對外條約的勵行」，致使清代臺灣與對岸的人、物往來受到約制，臺灣經濟失去某種程度的「彈性」。

日治時代的臺灣從今天臺灣學術界各種研究積累成果可知，臺灣並不因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封閉在日本帝國的政經勢力範圍內。從經濟的角度看，前述海洋國家開放型的體質也未曾稍改，但是為何可以如此？我個人長期以來因為不甚了解，所以裝作這個問題意識不存在。然而在翻譯濱下老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開

始有了更廣泛且深入的認知，也逐漸理解到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不僅無法遮斷濱下老師文中所強調環中國海域前殖民地階段的經濟自律性，甚至還相當依賴這種臺灣漢人與此海域華人華僑所建構的網絡。這種網絡關係可謂歷久彌新，一直延續到今日，或許這就是近現代臺灣史與臺灣的研究，其難度甚高的原因。

最後，容許我藉這個場合感謝濱下老師的學恩，我雖然不是濱下老師正式入門弟子，但是在我學位論文的寫作及回臺灣之後的研究教學，確實一直感受到濱下老師微溫卻始終存在的教導。濱下老師對我們這些亞洲留學生非常好，我記得有次下課把我叫住，給我一片他在琉球（沖繩）買的黑糖，說既然研究近代日本的糖業，就感受一下琉球砂糖的滋味。我對近代日本糖業是從馬克思經濟學的觀點切入，琉球黑糖吃起來，意識上難免有種資本剝削搾取的苦味，但是濱下老師賜與的甜味，至今依舊鮮明地延續著，再次感謝濱下老師。

吳密察發言

最後，輪到我說來幾句話。我當初為了選擇什麼文章來翻譯的時候，的確很苦惱過一陣子，但是後來決定從三套當年濱下老師企劃的叢書找文章之後，反而讓我重溫了留學時代的學習歷程。我在本書的導讀中大致地回顧了我留學時代幾套印象深刻的世界史叢書，大家或許可以從中理解 1980-1990 年代，日本學術界的大致氣氛。

我自己性格上比較「沒大沒小」，講話比較直白，所以濱下老師在我 1989 年要回臺灣之前，主動要我在研討課上做一次報告，並且具體地要我「對日本的學術界做一點批評」。拜託，叫我對日本的學術界做批評！他當時可能不是用「批評」這兩個字，因為大家都知道濱下老師是很客氣的人，他是不會講那麼直接的話的。或許他是說：「你好像對日本的學術界有一些看法、有一些意見，你是不是可以報告一下？」結果我就應他的命，在研討課上做一個報告，記得我那個報告的題目是：「從臺大教授的書齋，到神保町書店店頭的社會史熱潮」。

我的報告題目為何如此訂呢？那是因為在那次報告中我從在臺灣準備留學階段講起，談到到日本留學之後的一般性觀察。我去日本留學之前其實是做了一些「準備」的。那時候留學之前能夠做的「準備」，就是先把日文搞到一定的程度（對我來說，所謂日文程度也就只是能夠讀一般學術書的程度），然後就是去向老

師們借書(這些老師們在 1960 年代晚期、1970 年代初期留學日本時買回來的書)來讀。那個時候我的日文能力有限,書中內容也未必真讀得懂,但畢竟還是生吞活剝地知道了一些人名、專有名詞。結果真去日本留學的時候,才發現那些好像都不太能用了。不太能用到什麼程度呢?舉個例子說,當時要進入研究所時必須提出一篇「小論文」。我交出去的那篇小論文,在腳註裡面引用丸山眞男的一篇文章,考試時被一位印度史的老師(當時大概 60 歲左右)說:「丸山眞男,我們讀書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要讀的;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讀了」。我本以為能夠引用丸山眞男,似乎可以表示我不是完全門外漢的樣子,沒想到在入學考試時就被澆了一盆冷水。當然,另外那些像「亞細亞生產樣式」之類的詞彙,就根本派不上用場了。顯然,我留學前讀的那些,在日本已經退流行了。

那麼,流行的是什麼呢?當時日本史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學者,中世史的學者,他的每一本書都是暢銷書;另外,一位西洋史的學者,也是中世史的學者,也是每一本書都是暢銷書。當時即使像我這種研究中國史的啦、臺灣史的啦、日本近代史的啦,也都跟著人家「追星」,即使未必看得懂也多少去買來讀讀。

這就是我那一個報告「從臺大教授的書齋,到神保町書店店頭的社會史熱潮」的時代背景。後來我發現,沒錯,那就是日本的戰後歷史學已經到了亟需更新,很騷動地想要尋找新方向、可能性的時代。濱下老師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裡,幫我們開拓出新方向、新視野、新主題的先驅者。

另外,剛才大家談下來,好像把濱下老師的學問介紹成為就是在講歷史的大框架。但是,這樣的介紹完全是片面的。例如,上個禮拜濱下老師在高雄所做的演講,⁴ 他所提示的演講資料有幾個表,其中資料之細密令人印象深刻。濱下老師的演講提示了幾個 Excel 表格。他將打狗海關報告裡面的醫事報告之內容,做成 Excel,其中一個表的 X 軸有十幾個欄位, Y 軸則有三、四百列,幾個表格加起來可能有上千列。從這些表格可以知道濱下老師的研究之精細程度。

剛才李侑儒說東大的訓練有「三行主義」之稱。我倒是沒有聽過「三行主義」這個詞,不過我的確受過類似的訓練。我在濱下老師的課上,跟同學們讀過山西票號的書信,也讀過鄭觀應《航西日記》。我記得同學讀《航西日記》中鄭觀應從香港搭上西洋船赴歐洲,其中鄭觀應日記中寫的是該船的中文船名,該同學報告

⁴ 濱下武志主題演講,「開埠初期打狗港口與地方社會—以《打狗海關報告》為中心」,高雄歷史博物館主辦「開港 160 週年—打狗回望、高雄啟航:歷史與海洋文化國際研討會」(高雄:高雄科技大學,2023 年 12 月 8-9 日)。

時說了一句話：「這是中文船名，不知道該船的英文名稱是什麼？」結果濱下老師接了一句話：「這去查《北華捷報》，應該查得出來！」就這麼一句話，我們那位同學到東洋文庫去查《北華捷報》的微卷，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終於找出那條船的英文名字。

除了細密的史料功夫之外，我想也不應該遺漏濱下老師從事研究時的田野調查工作。濱下老師曾經跟我說過他到東南亞做田野調查的經歷。東南亞鄉下的交通等各項條件，經常不是很好，有一次他搭載貨上山貨車的便車下田野。他坐在司機旁邊副駕駛座的位置，但那卡車前面的擋風玻璃卻是破的，他就坐在那輛冷風正面撲來、前途黑暗只有車燈照著山路的車子，顛顛簸簸地走了六、七個小時才抵達目的地。濱下老師關於華人企業、華商金融、華僑匯兌、印度商人的研究，很多是建立在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的基礎之上的。

我怕介紹濱下老師的時候，把他的另一些方面給遺漏了，因此做了一些補充。接下來就請濱下老師回應我們這些學生們的報告。

濱下武志發言

非常感謝大家的評論以及介紹。

我想先說一件事，剛才大家都叫我「老師」。「老師」這兩個字中，「老」這個字我同意，因為我老了（笑）；但「師」這個字，我不同意。因為我跟「制度」上的「學生」之間的關係，我從來不把它當作「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學生」是因為行政上的需要，所以才成為我的「學生」，但我跟他們、或是說我和每一個人之間，都是橫向的關係，而不是上、下的關係；都是朋友關係，也是競爭關係。

我是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剛才每一位學者介紹幫我翻譯的文章。從大家的介紹，我也感到這是每一位學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從這些不同的看法，我也重新思考過去三十多年間各位的研究，再回頭看這本書，又重新得到一些新的想法。吳密察老師剛才也提到，本書最晚的一篇論文發表於 2000 年左右。從 2000 年左右到現在，又經過 20 多年，我自己覺得我有點進步，所以希望各位老師把我這個時代的論文找來，再努力翻譯（笑），我希望透過各位的翻譯，理解你們新的看法。

同時，我也感到學者們共同翻譯的力量非常非常大，我們以後可以從這裡展開更多樣性的研究課題。老師們都提到，我的研究是比較開放性，或是從比較多

樣性的角度來發現不一樣的歷史脈絡，整合在一起。一方面我需要非常綜合性的方向來討論、建立新的概念，同時需要非常具體的調查資料、經驗，才能寫文章。這個過程跟一般學術界的方向不太一樣，但我不一定直接明說。吳老師剛才說我是非常客氣的人，我自己認為，用日語的話必須非常客氣。所以我不喜歡使用日語，不用日語發言的話，可以不用客氣。我喜歡用隨便的中文，或是隨便的英文，這是為了離開日本，或者為了離開日本人的認同，這是我上大學以前就已經確立的原則，一直到現在五十多年了。

我書裡面所寫的，所有的部分，都是我自己親自體驗，或者用文字來確認問題才寫出來的。跟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有些類似，但角度不一定一樣，這是非常「自我流」的田野方法。不只是戶外的田野，資料館、檔案館裡面也有田野。我的老師田中正俊教授曾說論文不是用手寫，而是用腳寫。這個意思是寫論文必須跑來跑去找資料、看書。我也用類似的做法。例如這個海域圖中，這一個個圈圈，也是我從飛機航行上自己親自確認，經過這樣一個過程，思考用什麼方式來描寫海域，才是最具合理性、歷史性的做法。其實這很具體，不一定是抽象性的討論。

還有，我一直有一個很強烈的想法是，很多時候，知識分子非常集中討論民族和國家，我們可不可以反過來展開更多樣性的網絡。今天鍾淑敏老師提出的琉球網絡問題，從琉球列島裡面的島嶼之間的關係來思考臺灣史研究的方向，我也很想討論這個方向。鍾淑敏博士生的時候研究海南島的歷史，那麼這個海南島研究的經驗或過程，可不可以應用在琉球／沖繩，或者臺灣，或者其他地方。她一直維持這個關心，也不斷在臺灣史研究裡面實踐。

鍾淑敏老師提出的問題，對我來說是海洋研究中比較關鍵性的問題。一般多是從陸地或港口來看海洋，但是，如果我們從海洋來看港口、陸地的話，那麼現在地理學所說的港口、陸地關係一定會反過來。為了要證明這樣一種歷史擴展，需要擴大我們的視角、資料、方法。

如果只以臺灣的角度來看臺灣史，臺灣學者已經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如果從外面的角度來看臺灣島的歷史地位，我們可以從更多樣性的角度來看。曹永和老師的臺灣島史觀，是階段性的，我們還可以從海洋、島嶼來展開、討論臺灣的問題；也可以從東亞、亞洲，或者世界、全球性的角度來看臺灣。從海洋的角度來看歷史，不只是臺灣，日本、東南亞、東亞、亞洲，都可以這樣展開。其中，我比較重視海域問題。這個海域不一定集中討論某個民族或國家，而是洋流經過的

空間。如果我們以海域來討論世界史，就會和過去有點不同。過去 300 多年來，以國家、民族為中心來看歷史，大概是從 1648 年的 Westphalia 條約以後，以國家為單位、國際關係為主的分析。但是，面對環境、資源的變化，新出現的問題怎麼解決，有沒有可能從歷史角度來提供一些方法、材料。一個方法是從以海域為主的海域和海域圈，來重新理解世界史。以亞洲為例的話，這個海域的連鎖可以說明亞洲的歷史，並不是討論東亞出現某某國家這樣的方法。如果以東亞海域的連鎖來討論，關注連續性的海域，一直綿延到歐洲，歐洲歷史也可以從亞洲海域的角度來重新討論，這樣也可以討論世界史的問題。

今天不是我做報告，以下我回應老師們提出的問題。第一位是李侑儒老師。對我來說朝貢問題是很大的題目，不能簡單做出結論。在朝貢體系中，我強調福州貿易的重要性，不一定是以北京為主的朝貢關係，而是關注福州、琉球之間的貿易。朝貢是未來討論東亞，或亞洲，也或許更擴大範圍，能有更多方面的討論。謝謝你提出這個問題。

關於研究和研究費用的關係，戰後我們做研究，一般是申請研究計畫，拿到研究費才來做研究。反過來說，研究費補助結束，就停止研究計畫，這樣很可惜。我對研究活動以各種不同的做法，讓它可以長期延續下來。有時候，想到什麼需要馬上去做調查，這種情況，我立刻就要去，沒有時間事先申請什麼研究費，所以我的薪水都拿去買飛機票。30 多年來，我非常感謝我太太。她一直照顧家庭、照顧孩子，還有關注孩子的教育。她本人是高中的化學老師，每天到學校教書，任教 40 年。因為我一直跑來跑去，她一直照顧家裡。現在我感到我應該還給她她為了我所花費的時間與精神，為她準備可以自由做自己喜歡的事的條件。包括這一次的臺灣旅行在內，希望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機會。

許佩賢老師介紹我關於陳荊和老師的研究，陳荊和老師在東洋文化研究所時，編輯《大越史記全書》，你介紹了他的父親。還有你強調知識分子的視角、「知域」的問題。對我來說，「知域」的問題是一個比較擴展性的概念，同時也是比較流動性的概念。因為以人為主要的研究，那個人去什麼地方，做什麼事情，就是以人為主。但是以知識為主來研究歷史的話，不一定受到地理空間範圍的限制。從你說明的事情，我學到很多事情。你把文章中的「亞洲」替換成「臺灣」，讓我印象深刻。不一定翻譯完就結束，也可以從這裡發現新的問題。謝謝。

陳延媛老師提出了許多照片。1992 年韓國、中國建立邦交，三位韓國博士生來到東京大學，她是其中之一。關於第二人稱、第三人稱的歷史敘述，在一個歷史裡面「我跟你」的關係、視角，與為什麼做這個研究，或者因為什麼目的來做歷史研究也有關係。一般說來，「我的歷史」也許比較簡單；「他們的歷史」，也就是第三人稱的歷史，也比較容易做；但是第二人稱，「我跟你之間的關係」的歷史，不一定由我這方面來做，也可能由對方單獨做。這也與鍾淑敏老師提出的移動問題有關，一般都認為移動或離散是不好的，穩定是好的，這是儒教社會帶來的觀念。但是，我們要改變觀念，應該開始認為移動或改變也可能是好的，以這個觀點來看歷史的話，我想歷史研究會有和過去不同的可能性。「第二人稱歷史」的手法，我自己認為是以僑民、移動、移民、變化為主來思考歷史。現代是變化很大的時代，包括全球化問題、氣候問題、海洋問題等，有很多大的變化，因此我們必須改變歷史研究的想法。

陳延媛老師的照片中，延世大學入口的花，日語叫做「ボケの花」(木瓜花)，一種花有兩個顏色，非常漂亮。我在延世大學一共九年，不一定一直住在那裡，是來來去去；還有在新加坡五年，也是一直來來去去。我大概是八十年代以去英國為主，八十年代後以去美國為主，後來從在歐美做亞洲研究到在亞洲做亞洲研究、東亞研究，所以之後我比較常在亞洲。那時候，常去韓國的延世大學、臺灣的臺灣大學，還有香港、新加坡等。2000 年左右碰到疫情的時候（編按：應該指 2003 年左右 SARS），飛機都是空的，只有兩三個人。比如從新加坡直接回來日本的話，飛機不太順利，所以先去曼谷，然後轉機回來日本。

非常感謝郭婷玉老師的說明。現在琉球《歷代寶案》已經電子化，我們可以利用電子化來尋找關鍵字。我曾試著打「朝貢」兩個字，結果只有很少筆資料。但是，打「貢品」的話，就很多資料跑出來。也就是說，「朝貢」是當時代人的做法，但當時人不一定認為自己在「朝貢」。現在電腦可以 text mining，text mining 某一個關鍵字，會有多少資料跑出來，我們可以利用這些軟體來判讀文獻；因為數位化的關係，我們擁有和以前不一樣的解讀能力。《歷代寶案》中雖然有寫到一些與薩摩藩有關的事，但基本上不會特別提到琉球和薩摩藩之間的關係。琉球本來是三年一貢，後來兩年一貢，但事實上是每年一次，為什麼？因為，琉球提出要接送使節。所以雖然兩年一次，這一年送，下一年接，所以琉球每年都在福州做貿易。還有，事實上，派遣接貢使節的方式其實是基於薩摩藩的要求。有時候，

清朝允許琉球免貢一次，不需要來貢使，結果沒有辦法貿易。薩摩藩對此感到不滿，而要求琉球進行更多次貿易。也就是說，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但是實際上琉球與薩摩藩的關係一直存在。李侑儒老師剛才也有提到朝貢問題，琉球和福州的貿易，代表琉球的朝貢關係，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說起黃紹恆老師，我的第一印象是 20 多年前他請我在木柵的貓空喝茶。記憶中，在山坡上喝茶，遠眺山坡，那是一段非常愜意、寧靜的時光。一方因為我是靜岡人，而靜岡是種茶的地方，我感覺很舒服，同時很羨慕黃老師能在這麼好的環境中進行研究。

黃老師研究的是亞洲經濟史，我想我們有很多共同的關心。特別是我想在亞洲經濟史的脈絡下研究日本經濟史，所以我對黃老師的製糖業研究很感興趣，認為這是研究本土產業的一個重要課題。當時的日本經濟史研究，以明治以來的日本近代史研究為主，重視經濟發展方面的研究，而且很傾向於在西方經濟史的背景下看日本經濟史，認為現代化就是工業化，工業化就是西洋化的實現。相對於此，黃老師的研究側重地方傳統產業，並將其與金融、保險和航運等可謂「無形貿易」的歷史背景連結起來。他還向我們展示了通過歷史性的本土產業研究亞洲區域經濟和亞洲經濟體系的可能性。此外，關於臺灣銀行歷史的觀點表明，研究當地金融業的多樣化和多層次聯繫非常重要。我相信在當前的全球化時代，這將成為一個更加重要的研究課題。非常感謝黃老師提出的諸多建議。

吳密察老師在 1980 年代出現在我的課堂上，他常常提出很重要的發言，例如歷史研究到底是要有趣、還是有用等問題。我那時候沒有直接回答，但是我自己想過這個問題，我的答案是，如果對知識分子來說有意義的話，應該就可以。還有，他也介紹很多資料；對我個人來說，很重要的是，他提到戰前、戰後學術的斷裂及延續性，還有一個、一個學者的變化，或者他們的研究態度等。

這一次吳密察老師寫信給我，說三年前開始規畫要翻譯、出版這本書。我想，翻譯過程一定有很多問題，我本來想跟他說，如果有任何問題，我可以努力說明，但是不敢說，而一直沒有說。但是最後還是實現了這本書的出版，我非常感動，也非常感謝。我發現，各位老師們有很大的力量。所以以後我想更多和各位討論、交流。這一次來到臺灣，從高雄、臺南、臺北，和各個地方的老師們和學生們見面、交流、一起吃飯，都是很好的新的體驗，也學到了新的論點。其中特別

高興的經驗是除了今天的交流之外，12 月 13 日跟周櫟楷教授的交流，討論有關哲學和歷史的關係，亞洲史的西洋契機和西洋史的亞洲契機問題等，也是很重要的提醒。⁵

今後我將努力進行結構性的海洋研究、海域網絡研究、海洋氣象研究、從海洋來看的亞洲研究，希望能深化「海的亞細亞」研究。非常感謝，謝謝。

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濱下武志、周櫟楷座談會：『海的亞細亞』與『世界的連結網』：兩種史觀的對話」（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23 年 12 月 13 日）。